

评说晋徽两大商帮

□ 翁礼华

古 代文献记载，先秦时山西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但真正作为商帮，晋商起于明初盐政的“开中法”，中兴于清前期的票号，衰落于清末的外国银行业入侵。徽州自古以来，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因此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徽州）商人活动的记载，但真正作为商帮，则兴起于明中叶的“折色法”，盛于明代的“纲法”，衰于清道光改“占窝制”盐政为“票法”的改革。晋商和徽商两大商帮分别活跃于中国商界长达五百年和三百年之久。

这两大商帮都从盐粒上崛起，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其不同的特点。晋商的赢利方式是通过政府开中，以粮食和军用物资换取食盐贩卖；而徽商则通过以物折钱的“折色”向政府交钱，换取食盐专卖权赢得利润。前者环节多，后者环节少，徽商体力上的辛苦程度远不如晋商。

为了确保财富的平安和不断发展，他们在经营文化上都崇尚同乡先贤：晋商尊奉乡人关公（山西解州人），徽商则尊奉乡人朱熹（原籍徽州婺源，现属江西）。因此，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帝庙，甚至常常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把关公文化作为他们的伦理取向，以致关公文化极大地影响了晋商的精神、道德和行为。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礼”，就是到了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熹。如苏州、汉口、景德镇、吴江等

徽商会馆都“奉朱子入祠”，把朱熹的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徽商“学而优则仕”、“贾而好儒”、“左儒右贾”，赚了钱一定得让子弟读书考取功名。而晋商则“学而优则商”，子弟书读好了，一定要去经商赚钱，并不特别看重功名。因此，在整个清代科举考试中选拔出的114个状元中，安徽就有9人，以省为单位排名，居江浙两省之后，名列第三。尽管山西没有文状元，但由于山西历来多战场，商人中有不少习武之人，加之商品贩运及金融流通之需，离不开沿途保护贩运的镖行、镖师，因此，清代山西产生了5位武状元，除当时地区总人口数远高于山西的浙江、江苏外，还是名列前茅的，武林中有名的形意拳就发祥于山西太谷县。

在用人上，晋商和徽商的相似之处都是用熟人。其中的差别是：晋商用乡人而不用亲属，称为避亲，而徽商则习惯于用亲属。晋商企业用人只能从乡人中择优保荐，从乡人中破格提拔，财东与掌柜既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更不能荐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晋商用乡避亲之举，既有利于企业管理，也表达了财东造福乡里之意，而且所用乡人知根知底，利于管理。徽商为了规避用亲的风险，强化企业管理，一般会通过大修宗祠，用朱熹理学所倡导的尊卑长幼的宗族力量来强化对企业内部族众的规范和控制。

晋商和徽商都是背井离乡、跨地区经营的商帮，具有共性，不同的是晋商常常只身外出“闯西口”，一去数年，待赚了钱才回家；而徽商则

往往举家外迁，聚族经营。这与徽州人祖先早年为避战乱，自南北朝以来陆续从北方迁徙南方，具有迁徙传统有关。而晋商则由于安土重迁，也就很少有外出经商带家眷的习惯。在历史上有记载的举家外迁的典型事例，也只是清初大学者阎若璩的先辈，在明中叶开中纳粟改为折色纳银后，才从山西迁到扬州。正如清代学者纪昀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

赚了钱，就回家乡买田造房，以光宗耀祖，这不仅是中国人的历史传统，也是晋商和徽商的共同特点，但在宅院具体的建造上，两者则存在很大差别。由于晋商位居山西，气候干燥，建筑风格集中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的特点。再加上山西人少地多，宅院普遍比较宽敞，如祁县乔家大院，占地面积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为全封闭式砖墙壁，有城墙垛口、更楼、眺阁等，是一座城堡式建筑。徽商位居江南，人多地少，宅院面积远远比不上晋商，如黟县宏村汪氏承志堂，为徽商大型民宅，占地面积仅2800平方米。在建筑风格上，徽商注重朴素淡雅的建筑色调，别具一格的山墙造型，紧凑通融的天井庭院，奇巧多变的梁架结构，精致优美的雕刻装饰，古朴雅致的室内陈设。徽商聚族而居，村舍讲究依山临水的自然布局，错落有致的空间变化，幽深宁静的街坊水巷，景色如画的村头装点等特色。

（作者为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

责任编辑 陈素娥